

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与苏联对以色列外交 (1948—1953)

江艺鹏

摘要: 为了打破英美对近东的控制,苏联在以色列建国后不久便要求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苏以双方此后围绕“俄国财产”问题展开了多番交涉。然而,受到冷战局势和近东冲突的影响,相关交涉又被牵扯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政府的“耶路撒冷之争”当中。这一系列问题显示出战后近东外交格局的冷战化进程,导致该地区政治经济问题复杂化。近东地区“被卷入”冷战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苏联、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多方互动的结果;同时受到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近东地区的冷战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在近东各国与大国之间设置了一道“文化屏障”。

关键词: 俄国财产;巴勒斯坦;阿以冲突;苏以关系

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русское имущество)曾被誉为“俄国在圣地的事业”,展现出沙俄政府渴望建立“第三罗马”的梦想。^①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历来是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十八世纪以来,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前往巴勒斯坦建立海外教会并在当地购置了大批财产。“俄国财产”主要位于耶路撒冷的“新城”,^②包括大小教堂、学校、朝圣者房舍以及养老院等设施。^③沙俄政府借助东正教教会的力量,以这些财产为基础扩大在海外的影响。东西方冷战爆发后,苏联政府

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向新生的以色列政府要求接管“俄国财产”。^④受到当时冷战局势的影响,苏以双方之间有关财产问题的交涉被搁置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将大部分“俄国财产”出售给以色列政府,仅要求接管其中的数座建筑物。此后,苏以两国政府有关“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有了定论。

最近二十年,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与冷战史研究的兴起,学界愈发关注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对苏以外交关系的影响,^⑤尤为重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作者简介:江艺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邮编 200241)。

①Dov Yaroshevski, “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 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Vol.22, No.1, 2003, p.59.

②“新城”指的是耶路撒冷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扩建的区域,而原有的区域则被称为“老城”。参考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284页。

③Dov Yaroshevski, “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 1917—19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Vol. 22, No.1, 2003, p.57. 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8页;邵丽英:《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④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46, pp.34—35.

⑤参考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46; Joseph Hell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8—67*,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Yezid Sayigh & Avi Shlaim ed., *The Cold War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对以色列政策的转变过程。^①已有研究的重点在于苏以两国政府之间的互动,较少关注冷战中的多方博弈及其对近东外交格局的重塑。^②而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苏以双方围绕“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持续多年,且恰逢冷战在全球蔓延之际,本应为苏以双边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俄国财产问题高度冷战化,牵扯到苏以、美苏、美以等多重双边关系及其之间的互动。基于有关该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③本文运用《苏联—以色列外交关系档案集》^④和《近东冲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文件选编》等解密档案,^⑤梳理苏以双方对“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过程,关注斯大林执政后期苏联政府对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因素。在弥补学界关于苏以关系研究所存在的缺憾的同时,^⑥笔者尝试探讨战后中东外交格局的冷战化重塑问题,并回应“冷战在近东地区的形态及其特征”这一问题。

一、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之缘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向其他参战国承诺战后共同分割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的土地。1916年5月,英法俄三国代表秘密缔结“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规定英法将分别统治伊拉克南部和叙利亚大部分土地,而英国还间接占据了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地区。当时,俄国的国家实力衰退,无暇顾及远在东方的扩张,仅要求划出一块国际飞地用以管理宗教事务。^⑦1917年10月,俄国国内政局剧变,布尔什维克党上台执政并宣布退出一战。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失去了沙俄政府的资助,无奈之下将耶路撒冷的主要建筑出租以维持生计。^⑧于是,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成为英国驻军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场所。一战结束后,英法双方通过圣雷莫会议(Conference of San Remo)达成协

①关于“苏联政府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原因”,学者们做出如下推测:(1)以色列不够马克思主义;(2)以色列政府亲美;(3)苏联政府的政策转向阿拉伯国家;(4)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思潮复活;(5)日丹诺夫主义;(6)英国势力从巴勒斯坦退却。参考 Galia Golan,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World War Two to Gorba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8. 但是,已有研究尚未指出苏联政府改变对以政策的标志性事件,使整个转变过程的论述比较分散与模糊。

②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6至341页;黄民兴:《分析冷战在中东的分期和特点》,《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第40页。

③关于“俄国财产”问题,已有研究包括沙俄时期东正教教会在巴勒斯坦的扩张行为,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土地政策以及“俄国财产”的法律地位之变化,可参见 Uri Bialer, *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 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67*,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Yehoshua Freundlich, “A Soviet Outpost in Tel Aviv: the Soviet Legation in Israel, 1948—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vol.22, No.1 (2003), pp.37—55; 邵丽英:《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④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 1941—1953 гг.,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 London: Frank Cass, 2000.

⑤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Москва: МФД, 2003.

⑥ Walter Z. Laqueu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Praeger, 1959; Walter Laqueur,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Macmillan Press, 1969; Yaacov Ro' I, *Soviet Decision 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 1947—1954*, Transaction Books, 1972; Arnold Krammer, *The Forgotten Friendship: 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 1947—5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Robert O. Freedman,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70*, Praeger, 1982; Yosef Govi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53—1967, From Confrontation to Disruption*, Frank Cass, 1998; 赵克仁:《试析前苏联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态度和政策的演变》,《西亚非洲》1993年第4期;杨曼芬:《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李鹏程:《1947—1957年苏联对以色列政策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梁桂胜:《从合作到分裂:1947—1953年苏联—以色列关系研究》,西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哈云青:《从蜜月到断交——1948—1953年苏以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肖瑜:《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北京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再考察》,《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苏联因素》,《西亚非洲》2010年第8期。

⑦ Arthur Goldschmidt Jr. & Ibrahim Al-Marashi,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Twelfth Edition,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19, pp.174—176.

⑧ 邵丽英:《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议,由英国政府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而“俄国财产”也随之由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管理当局保管。^①这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不被承认,所以它无权接管沙俄政府在巴勒斯坦的财产。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剥夺宗教组织的各种特权,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统一监督之下,使改造后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相适应。^②1918年2月18日,苏维埃政府颁布《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法令,该法令对东正教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作出了新的规定。根据法令,东正教在沙俄时期获得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全部被取消。苏联国内的教会和宗教团体和财产一律没收。^③按照上述规定,沙俄时期东正教教会的海外财产应该国有化,那么苏维埃政府就有权接收在巴勒斯坦的“俄国财产”。1923年5月,苏联政府借本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伦敦之机,再次提出“收回”在巴勒斯坦的俄国东正教教会财产。^④苏联驻英国使馆代表 К. 拉科夫斯基(К. Раковский)向英国方面声明:“位于巴勒斯坦的俄国东正教教会财产属于苏联政府所有,任何人在未经苏联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都无权处理这些财产”。^⑤英国方面答复说,除非有法律文件能证明苏联政府拥有继承权,否则他们不会交出这些财产。^⑥苏联政府拿不出相关的法律文件,自然无法继承前沙俄政府的海外财产。而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坚持效忠前沙俄政权,也反对苏联政府接管“俄国财产”。如此一来,苏联政府在该问题上无计可施,只能望洋兴叹。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放宽了对国内宗教活动的限制,以爱国主义凝聚人心,集中全国力量抵御外敌,同时还授意国内的东正教教会与海外宗教团体建立联系,为国家争取更多的战争资助。1943年,苏联人民委员部俄国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Г. Г. 卡尔波夫(Г. Г. Карпов)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议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正

式要求“收回”位于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财产,增强俄国东正教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苏联人民委员部副外交人民委员 И. 迈斯基(И. Майский)也指出,苏联政府应通过外交、政治和文化等措施扩大在巴勒斯坦的影响。^⑦当战争慢慢走向尾声,苏联社会经济各领域百废待兴,急需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苏联政府在近东政策上比较克制,恐怕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И. 迈斯基认为,战后应该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使“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和平得以维持。”^⑧此外,他还建议苏联政府不要援助泛阿拉伯运动,以免同英国政府产生矛盾。苏联外交部中东局也提议,苏联政府不应插手中东地区的阿犹冲突,防止英国在“俄国财产”问题上制造障碍。^⑨由于不想触及英国的势力范围,苏联政府在财产问题上并无进展。

在苏联政府看来,“俄国财产”只是前沙俄政府的海外财产,并不具备战略上的重要意义。1945年3月3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С. И. 卡夫塔拉泽(С. И. Кавтарадзе)向莫洛托夫报告,说英美的石油输送管道将会经过巴勒斯坦,苏联政府迫切地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据点,以便监视英美的石油政策。他的建议是设立苏联驻巴勒斯坦领事馆,并不是接管与利用当地的“俄国财产”。^⑩“俄国财产”问题仍然是一个宗教问题,尚未进入苏联近东政策的计划。当时苏联政府也是通过宗教途径去沟通该问题。1946年,莫斯科教会的阿列克谢大牧首一行抵达耶路撒冷,与当地的东正教教会人员建立初步联系。^⑪然而,随着非殖民化运动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发展,苏联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改变。

战后英国政府的海外势力日益衰退,逐渐从埃及、印度和巴勒斯坦退却。中近东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不断壮大。而美国和苏联也以巴勒斯坦问题为契机,极力把英国赶出中近东地区。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俄国财产”不再

①布尔什维克党上台后下令废除沙俄政府此前签署的秘密协定,可是这个新生政权当时得不到英法两国政府的承认,英法双方认为沙皇政府很快就会重新掌权,决定保留俄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Dov Yaroshevski, "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 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Vol.22, No.1, 2003, p.57.

②③常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第164页。

④⑤⑥Dov Yaroshevski, "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 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Vol.22, No.1, 2003, p.59, p.59, p.59.

⑦⑧А П Р Ф. Ф.3. О п.63. Д.237. Л.52—93. Л.52—93.

⑨АВП РФ. Ф.0118. О п.7. Н.4. Д.5. Л.26—2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1. С.108—110.

⑩АВП РФ. Ф.0118. О п.8. П.4. Д.2. Л.9—1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1. С.112—113.

⑪АВП РФ. Ф.089. О п.1. П.2. Д.12. Л.3—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1. С.331—332.

是一个宗教问题。它被苏联政府纳入对近东地区进行渗透、扩大对中近东的影响的政策当中。

二、苏联重提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

二战结束后,苏联利用其战胜国的地位向南扩张,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拒绝从伊朗撤军,还谋求获得在伊朗的石油租借权。^①受到英美的合力抵制之后,苏联政府又把目光投向近东地区。^②1947年2月,阿犹双方的矛盾由于欧洲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而被激化,英国政府被迫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这恰恰为苏联政府插手近东事务、重提“俄国财产”提供了一个契机。

1947年11月29日,在美苏两国代表的支持下,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181号决议)》,规定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耶路撒冷作为“独立个体”接受国际共管,任命一位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由各国派驻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③不久之后,“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解委员会”成立,制定了耶路撒冷的管理方案,并赋予总督任命管理委员会的各国代表的权力。^④很可能,正是第181号决议的通过提高了耶路撒冷及其当地的“俄国财产”在苏联近东政策中的地位。根据苏联方面的调查,“俄国财产”除了位于耶路撒冷的主体部分之外,其余分布在橄榄山(Mount of Olives)、雅法(Jaffa)和伯利恒(Bethlehem)等地。^⑤如果苏联政府能顺利接管这些财产,就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起据点,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近东地区的影响。在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苏联政府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无异于往英美的势力范围打下一个楔子。因此,耶路撒冷的命运是苏联近东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

1948年3月1日,苏联外交部提出,各国派驻耶路撒冷的代表不能由总督任命,否则总督有可能不让苏联代表参加。^⑥更何况,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在近东各国人民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苏联政府极力争取对耶路撒冷事务的管理,除了想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也试图与英美争夺在近东问题上的话语权。如此,支持实行联大第181号决议的规定、对耶路撒冷实行国际共管,便成为苏联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1948年5月14日,英国政府提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天下午,以色列宣布建国,美苏迅速予以承认。次日,阿拉伯各国军队进攻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⑦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⑧而此时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恶化了。由于不满苏联政府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民众甚至举行了反苏游行。二战后期以来,苏联政府公开支持埃及政府废除英埃条约的行为,谴责法国政府出兵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⑨所以,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评价较高,它们都和莫斯科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⑩当联大通过第181号决议之后,埃、叙、黎三国政府派人请求苏联政府改变立场,希望莫斯科能站在阿拉伯人这边。但苏联政府不愿意放弃管理耶路撒冷的机会,莫斯科方面坚持认为,应该实行联大第181号决议的相关规定。^⑪与此同时,苏联政府通过东欧国家分别向阿以双方军队出售武器。^⑫阿拉伯军队拥有英国政府提供的武器,以色列方面却受制于武器禁运,因此,来自苏东国家的武器对以色列军队的意义更加重大。苏以双方的关系被迅速拉近了,而阿拉伯国家和苏联之间却有了隔阂。

苏阿关系的恶化迫使苏联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以色列身上。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被平息,苏联-

①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8、第115页。

②Uri Bialer, *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 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67*, p.159.

③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 Selected Documents 1947—1974, pp.92—110.

④⑥АВП РФ. Ф.47. Оп. 3. П. 11. Д. 29. Л. 1—4.//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 В. Наумкин. С.28, С.28.

⑤АВП РФ. Ф.012. Оп. 6. Д.81. Л.1—6.//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1. С.131—134.

⑦阿拉伯军队包括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五国联军。

⑧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282页。

⑨⑩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08页,第132页。

⑪1943年8月26日,苏联与埃及两国政府宣布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随后叙利亚和黎巴嫩也独立,立即得到苏联的承认,并立即互换外交使节。参考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97至98页。

⑫АВП РФ. Ф.087. Оп. 11. П. 16. Д. 5. Л. 1—2.//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 В. Наумкин. С.26.

以色列双方关系步入佳境,苏联政府提出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的时机也到来了。1949年2月至7月,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四国政府分别与以色列政府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战后外约旦军队占据了耶路撒冷老城,而以色列军队则占领了西区新城。由于“俄国财产”主要位于新城,因此大部分财产都被以色列军队接管。以色列方面将“俄国财产”交给犹太代办处的伊扎克·拉宾诺维奇(Yitzhak Rabinovich)管理。^①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向以色列政府提出接管这些财产,以色列政府不想得罪苏联政府,故同意与苏联方面交涉“俄国财产”问题。伊扎克·拉宾诺维奇认为,如果转移“俄国财产”的所有权,首先要联系原来的财产负责人。^②苏联政府知道这些教会人员不会接受莫斯科的领导,建议苏以双方绕开他们直接讨论接管问题,该提议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认同。^③然而,以色列政府并不愿意交出这些财产,尤其不想失去在耶路撒冷的“俄国区”(Russian Compound)。“俄国区”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建筑群,包括圣三一大教堂、医院、领事馆、给朝圣者过夜的住所和谢尔盖庄园等等。^④这个建筑群的所有权原本属于皇家正教巴勒斯坦协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ПО)及其主席С.亚历山德罗维奇(С.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⑤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俄国区”的建筑物被用作政府机构的办事处,例如移民局和公共工程局。当以色列军队占领耶路撒冷之后,也沿用了这些办公场所。此时再让以色列政府把各个机构迁出来,将这些财产交给苏联政府,自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局势日益加剧,以色列政府也感受到巨大的安全威胁。建国初期,以色列政府内部由“马帕伊”党(Mapai, 全称为“以色列劳动党”)执政。“马帕伊”党主张在外交上走中立路线,但是党内成员的亲西方倾向很严重。此外,还有第二大党——“马帕姆”党(Mapam, 全称为“联合工人党”),该党与苏联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⑥从1949年以来,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经常与以色列政府内部的“亲苏”人士来往,其中就包括“马帕姆”党的领袖斯纳·摩西(Sneh Moshe)。^⑦由此推测,以色列领导人担心苏联借助“俄国财产”实施渗透,增强以色列国内“亲苏派”的力量,甚至有可能干涉以色列内政。所以,以色列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迟迟不肯交出“俄国财产”。除了耶路撒冷的“俄国区”,其他财产的移交也是遥遥无期。这些财产属于前沙俄政府及其派出的前俄国宗教使团(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所有。为了名正言顺地接管财产,苏联政府还成立了新的“俄国宗教使团”,并任命莫斯科正教会的人员为该机构的代表,派遣他们前往耶路撒冷进行交涉。^⑧但是,新的“俄国宗教使团”得不到以色列政府的承认,因而也无法正式接管财产。^⑨1949年年底,“俄国财产”仍处于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之下,苏联方面的财产接管工作毫无进展。^⑩此时,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在联合国掀起波澜,苏以双方有关“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有了转机。

三、苏联欲打破在“俄国财产”问题上的僵局

第一次中东战争改变了近东的政治格局,也留下了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战争结束后,耶路撒冷

①Dov Yaroshevski, “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 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Vol.22, No.1, 2003, p.59.

②⑧Yehoshua Freundlich, “A Soviet outpost in Tel Aviv: the Soviet legation in Israel, 1948—53,” *Th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22, No.1, 2003, p.48, p.48.

③这些财产负责人中间存在一些反苏分子,他们不愿意把教会财产交给苏联政府。

④“Jerusalem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e late Ottoman Period(1850—1917)”, Jewish Virtual Library, May 22, 2020,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erusalem-architecture-in-the-late-ottoman-period>.

⑤皇家正教巴勒斯坦协会是前沙俄政府设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主要负责搜集巴勒斯坦地区的情报。Uri Bialer, *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 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67*, p.153.

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他曾经长期担任该协会的主席。Derek Hopwood, *Russian Presence in Syria and Palestine 1843—1914: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p.104.

⑦Uri Bialer, “Top hat, tuxedo and cannons: Israeli foreign policy from 1948 to 1956 as a field of study”, *Israeli Studies*, Vol.22, No.1, 2002, p.26.

⑨АВП РФ. Ф.089. Оп.1. П.2. Д.20. Л.7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1. С.405—406.

⑩АВП РФ. Ф.089. Оп.1. П.2. Д.12. Л.34—3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1. С.445—446.

⑪ISA 93.01/2202/5,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 Part 2, pp.556—557.

被以约两国军队分区占领。双方都拒绝将“圣城”交给联合国管理,反对实行第181(II)号决议的规定。^①这种行为不但引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也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此,联合国被迫重新开会讨论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②在东西方“冷战”环境的影响下,耶路撒冷的归属权不再是作为阿以矛盾焦点的地区问题,而是关系到美苏近东战略的国际问题。

从处理希腊和土耳其危机开始,美国就接过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担子,逐步将中东建成“反苏防共”的堡垒。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援助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第四点计划”,其援助对象包括近东地区的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③虽然美国政府更想拉拢阿拉伯国家,所以对以色列的援助相对较少,但是美国犹太人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再加上美国与以色列两国在文化上的亲缘性,因此以色列仍然在美国近东战略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1949年5月16日,美国国防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名为《美国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的备忘录,指出美国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为:A、确保以色列政府倾向西方民主国家,疏远苏联势力;B、堵塞共产党对以色列的渗透,防止苏联对以色列的控制;C、解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分歧和争端;D、从军方观点来看,应改善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使在对以色列的政策上美英能实现共同目标。^④1949年10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NSC47/2号文件,文件规定:A、努力维持以色列政治和经济的稳定;B、应当努力促成阿以之间解决争端,至少使他们在反对苏联控制和影响方面;C、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向以阿双方在解决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上提供帮助和指导。^⑤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美国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战略范围。

为了尽快稳定近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政府支持联合国调停“耶路撒冷之争”。^⑥但是,联大第181号决议并不符合英美的利益,因为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之后,苏联政府将会趁机干预近东事务,所以英美尝试制定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⑦以英美为首的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Palestine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PCC)提出了不少建议,可是各方的意见难以统一,始终无法拿出理想方案。^⑧1949年8月份,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让英美都喜出望外。该方案承认以约分区占领耶路撒冷,仅规定耶路撒冷城内的基督教圣地为“国际共管区”,由联合国进行托管,保证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⑨然而,这个方案被外约旦政府拒绝了。^⑩因为基督教圣地位于耶路撒冷的老城,属于外约旦政府的占领区域。如果这些地方交由联合国管理,外约旦军队就要被迫撤出。^⑪这个方案维护了以色列的利益,却要求外约旦单方面作出让步,外约旦政府自然不肯接受。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是英美在阿拉伯地区的忠实盟友,因此以色列的新方案失去了英美的支持。^⑫英美都要求以色列政府先征得外约旦方面的同意,务求制订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⑬以色列政府通过新方案占领耶路撒冷的计划破灭了。联大召开之日临近,为了废除第181号决议的相关规定,以色列政府转而向苏联政府寻求帮助。

苏联政府此时仍坚持原来的立场:支持实行第181号决议的规定,由各国代表委员会对耶路撒冷进行共管。而站在同一阵营的除了东欧国家,就是阿拉伯国家(外约旦除外)和大多数天主教国家。^⑭后两者是出于宗教原因,所以不会对以色列政府作出妥协。为此,取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变得格外重要。只要苏联不再支持第181号决议的规定,东欧各国将会紧跟其后,这就大大降低了联合国托管耶路撒冷的可能。^⑮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的顾问阿里耶·列瓦

①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282页。

②⑥⑦⑨⑩⑪⑬Gadi Heimann, "Divide and Rule: 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 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 Vol.17, No.1, 2017, pp.25, p.38, p.28, p.25, p.26, p.26, p.26.

③谢华:《对美国第四点计划的历史考察与分析》,《美国研究》2010年第2期。

④⑤FRUS 1949, Volume VI,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7, p.1009, pp.1430—1440.

⑧美国、英国和法国对耶路撒冷问题有不同意见。法国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其政府希望获得对基督教圣地的管理权。英国政府则支持外约旦政府进行大规模扩张。而迫于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英国只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保持低调。参考Gadi Heimann, "Divide and Rule: 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 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 Vol.17, No.1, 2017, p.28. 以及Peter L. Hahn, "Alignment by Coincidence: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rtition of Jerusalem, 1949—195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21, No.3, 1999, p.674.

⑫英国政府主张站在外约旦政府那边,但美国政府坚持考虑阿约双方的意见,所以英国政府被迫听从美国方面的主张。

⑬天主教国家希望联合国托管耶路撒冷,赋予他们管理城内的基督教圣地的权利。

⑮АВІІ РФ. Ф.022. Оп.2 а. П.12. Д. 4. Л.103—10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2. С.71—73.

维(Arieh Levavi)提议,以色列政府可以利用“俄国财产”,因为这些财产对苏联政府而言有着特殊意义。^①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 С.К. 查拉普金(С.К. Царапукин)说,如果联大第181号决议的规定被执行了,耶路撒冷表面上由国际共管,实际上被英美把控住。到时候,苏联政府连日常事务都很难插手,更别说接管当地的“俄国财产”了。苏联代表说,这两个问题不应该混为一谈。^②对此,莫斯科方面没有作出具体答复,或许是因为有着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试图借此打破苏以双方在“俄国财产”问题上的僵持。联合国正式托管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政府就无法继续占用“俄国财产”,这些财产的所有权要重新讨论,那么苏联政府就能参与其中。而且,耶路撒冷一旦接受国际共管,英美很难将苏联的影响排除在外。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打算绕开以色列政府来解决“俄国财产”问题,那就意味着以方的态度为莫斯科方面所不喜,苏联政府正在重新思考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苏以双方的关系并非毫无芥蒂。此前,双方针对苏联国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些矛盾。以色列政府多次请求莫斯科方面批准苏联国内的犹太公民移居到以色列。当时苏联国内的“反世界主义”(Anti-Cosmopolitanism)运动甚嚣尘上,苏联犹太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反世界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政治清洗运动。1946年8月9日,苏联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大批判。^③在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这场政治运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在1948年达到了高潮。而苏联犹太人在政府文化部门担任了大部分要职,难免沦为这场运动的主

要受害群体。^④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说,苏联国内不存在所谓的“犹太问题”,也没有犹太公民提出移居国外的要求。^⑤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力图杜绝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国内传播的可能性。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经常散发有关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宣传资料。^⑥苏联政府便下令监视使馆人员的日常生活,严禁他们与苏联国内犹太人私下接触。^⑦这些消息陆续传到了以色列国内,苏联政府的犹太政策遭到猛烈抨击。^⑧一时间,苏联国内的犹太人政策带来的冲击,双方在“俄国财产”问题上的矛盾,还有“耶路撒冷之争”引起的冲突,这些问题都使苏以关系变得更加脆弱。

当苏以双方矛盾重重之时,美国政府忙于协调各方的利益,放松了对耶路撒冷问题的掌控。一份支持第181号决议的提案进入了联大投票环节。1949年12月9日,第四届联大通过了《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议》,即第303(四)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1947年第181号决议的原则,确立了耶路撒冷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在国际法层面否定了以约双方的行为。^⑨美国代表反对第303号决议,斥之为“不切实际”的决议。^⑩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阿拉伯各国(除了外约旦)以及大部分拉美国家都表示支持。^⑪而有关“俄国财产”的交涉受此牵连,也立即被以色列政府叫停。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谈及此事,声称“大部分财产还没移交,也不会再移交。”^⑫这意味着以色列政府公开与苏联政府决裂了,双方的合作关系无法维系下去。

四、苏联政府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转变

1950年3月16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

①ISA 130.11/2514/15,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 Part 2, p.485.

②ISA 93.01/2202/5,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 Part 2, p.556.

③E. 祖布科娃:《1945—1964年的社会与改革》,转引自马龙闪《苏联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晰运动》,《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第77页。

④P. 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下册,何宏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966页。

⑤ISA 130.09/2325/3,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 Part 2, p.673.

⑥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8. Д.1. Л.1,5—7.//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63.

⑦ISA 130.02/2384/15,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 Part 2, pp.651—652.

⑧АВП РФ. Ф.059. Оп.24. П.52. Д.332. Л.141—145.//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61.

⑨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284页。

⑩Peter L. Hahn, "Alignment by Coincidence: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rtition of Jerusalem, 1949—195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21, No.3, 1999, p.674.

⑪Michael Brecher, "Jerusalem: Israel's Political Decisions, 1947—1977", *Middle East Journal*, Vol.32, No.1, 1978, p.18.

⑫FRUS 1949, Volume VI,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p.1532.

斯大林提议,苏联政府宣称不再参与耶路撒冷问题的后续讨论。约一个月后,4月17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 Я.А.马立克(Я.А. Малик)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声明,称“苏联政府认为无法继续支持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相信联合国能找出让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①这个消息让各国代表愕然。因为联大第303号决议公布之后,以色列政府将首都迁往西耶路撒冷,而约旦政府也宣布正式兼并东耶路撒冷。^②以约分治耶路撒冷已成事实,为何苏联政府还作此声明呢?

首先,冷战以欧洲为中心迅速向近东地区扩展,加深了美苏双方关系的紧张态势。从插手巴勒斯坦问题开始,苏联政府关注的就不是阿以双方的胜负,而是美国政府在近东地区的政策动向。美国力图在中近东建立区域性军事-政治集团,使苏联政府对国家安全感到十分担忧。1950年3月,苏联驻黎巴嫩和叙利亚大使 Д.С.索罗德(Д.С. Солод)向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该报告称,1950年1月份以来,英美在近东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虽然美国尝试掩饰这个问题,但英国在阿拉伯地区的行为经常受制于美国。^③据此,Д.С.索罗德认为“美国人正在公开地将英国人赶出去,这首先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紧接着在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后将轮到伊拉克和约旦,直至美国政府完全控制整个近东。近东地区将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们很快就会把矛头指向苏联。”^④不难想象,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政府对近东问题的重视,它预示着近东将变成美苏对抗的新战场,给苏联南部的领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1950年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出台。该文件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胜利,都是对美国及自由

世界的挑战。美国政府要帮助不发达地区和国家发展经济,以免这些地方爆发社会运动,让共产主义势力有可乘之机。^⑤通过这份文件,美国确定了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苏联政府面对美国方面的猛烈攻势,只能利用近东的动荡局势反击。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苏联在联合国长期处于被动地位。而耶路撒冷问题提供了一个报复英美的机会,于是苏联政府便借题发挥,宣布不再支持实行联大第303号决议,让联合国寻求符合近东人民意愿的方案。

其次,以色列政府试图利用美苏矛盾,争取来自双方的援助,却渐渐走上了“亲美反苏”的道路。建国之初,以色列政府试图走一条“中立”的外交路线。但是这种设想很快就破灭了,以色列政府的“亲美”倾向日益明显。从1949年开始,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叶尔绍夫就向莫斯科报告,说以色列政府内部的“亲美派”势力十分强大。^⑥其中,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就是“亲美”路线的支持者之一。他曾经亲自飞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商讨以美两国建立经济与军事合作关系的问题。^⑦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急需来自美国方面的经济援助。以色列政府鼓励全世界的犹太人移居过来,使得外国移民的人数在短时间内激增。大批移民的涌入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以色列国内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应本-古里安的请求,美国犹太人发行了以色列债券,还提供一笔6500万美元的贷款,为以色列政府解决了燃眉之急。^⑧这些加深了苏联政府对以美关系的怀疑,导致苏以关系进一步恶化。1950年3月10日,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叶尔绍夫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说,以色列政府在外交上的反苏情绪很强烈。^⑨以色列政府禁止国内对苏联友好关系协会的活动,^⑩严格限制苏联文学作品的传播。^⑪随后,苏联国内报纸《文学报》发表了题为《特

① АВП РФ. Ф.059. Оп.24. П.27. Д.154. Л.68—69.//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58—159.

② 1949年12月11日,以色列政府决定将首都迁往西耶路撒冷。次日,约旦宣布正式兼并东耶路撒冷。

③④ АВП РФ. Ф.0106. Оп.9. П.12. Д.1. Л.1, 12.//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С.114, С.114.

⑤ 谢华:《对美国第四点计划的历史考察与分析》,《美国研究》2010年第2期。

⑥ АВП РФ. Ф.089. Оп.2. П.3. Д.10. Л.6, 8—13.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40; 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6. Д.8. Л.211—226, 262—264.//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47—51, 140.

⑦ Avi Shlaim, "Israel between East and West, 1948—195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36, No.4, 2004, pp.657—673.

⑧ 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75至76页。

⑨⑩ 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6. Д.8. Л.211—226, 262—264.//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40, С.140.

⑪ 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8. Д.1. Л.1, 5—7.//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64.

拉维夫的追随者》的政论,嘲讽以色列政府打着“中立外交”的幌子,实则追随美国政府的“反苏反共”政策。^①当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提出访苏,莫斯科方面也是毫不理会。^②所以,在宣布苏联政府不再干预耶路撒冷问题之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拒绝了以色列方面的邀约,以此表明苏联此举并非为了帮助以色列政府。也许,苏联此举是为了防范美国通过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政府无视联合国大决议,强行占领耶路撒冷,挑战着联合国大会的权威。而苏联的声明再次强调了联合国的调解角色,相当于宣告耶路撒冷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以约两国政府的占领行为违背了国际法。

再次,阿拉伯各国强调美国势力对近东的威胁,以此争取来自苏东国家的援助。二战以来,苏联政府支持近东人民反对英法殖民统治,高度赞扬埃及、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民族独立运动,并将他们视为“进步的阿拉伯国家”。^③然而,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近东民族独立运动难以深入发展。由埃及政府倡导建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结构松散,各成员国相互争斗,无法达成统一意见。^④而国内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政府。^⑤所以,对阿拉伯各国政府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国家政权岌岌可危的现状。故此,利用美苏对峙局势、争取更多的援助才是最符合实际的外交路线。1950年4月14日,叙利亚财政部长对苏联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大使索罗德说,美国政府正在对阿拉伯各国政府施压,迫使他们与以色列政府缔结和约,从而构建近东的反苏军事集团,因此叙利亚政府急需来自苏联的援助。^⑥而埃及政府和黎巴嫩政府随后也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考虑到以色列政府的“亲美”举动,再结合阿拉伯各国

对苏联代表的接近,苏联政府宣称不再插手耶路撒冷问题并将其交给联合国,可能是为了加深阿拉伯国家对英美近东政策的不满,促使它们迅速地向苏联和东欧国家靠拢。苏联政府虽不参与讨论耶路撒冷问题,但是却密切关注着该问题的后续发展。而阿拉伯各国则更加积极地寻求苏联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⑦也许在他们看来,苏联政府对近东事务的态度更开放了。

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宣布退出“耶路撒冷之争”,将其完全交给联合国来解决,表明莫斯科不再帮助“亲美”的以色列政府,并倾向于加强与阿拉伯各国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苏联政府介入近东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也加快了英美控制中东的步伐,致使近东地区的局势恶化,并逐步变成“冷战”的试验场。

1950年5月,英、美、法三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发表了关于中东局势的《三国宣言》,宣称准备以武力干涉中东事务。1951年10月,英、法、美、土耳其四国政府发表关于组建“中东司令部”的联合宣言,要求中东各国共同对抗“来自外部力量的威胁”。“外部力量”指的就是苏联共产主义。英美试图以此拉拢阿拉伯各国政府,将阿拉伯地区与土耳其相连,建立起中近东地区的反苏军事联盟。^⑧以色列政府也签订了美以合作协议,作为对“中东司令部”计划的补充。^⑨但“中东司令部”的建立举步维艰,因为阿拉伯各国拒绝与土耳其、以色列合作。可是,英美并没有放弃这个设想,还推出了类似的计划。为了抵挡英美的攻势,苏联政府也考虑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1953年2月份,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苏联驻埃及大使说,告知埃及政府,莫斯科方面将考虑他们关于购买武器的请求。^⑩另一方面,苏以双方关系正在迅速地恶化下去。从1952年到1953年,苏联政

① Прудков. “Гель - авивски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 Ачесо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5 март 1950.

② АВП РФ. Ф.059. О п.24. П.52. Д.332. Л.199—200.//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88.

③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98至99页。

④ 1945年3月22日,在埃及的倡议下,埃及、沙特阿拉伯、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7个阿拉伯国家在开罗开会,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

⑤ 哈全安:《“肥沃的新月地带”诸国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9至110页。

⑥ АВП РФ. Ф.0128. О п.13. П.12. Д.6. Л.69—74.//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С.120—123.

⑦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144、第152、第383页。

⑧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36页。

⑨ АВП РФ. Ф.059. О п.26. П.58. Д.362. Л.81—84.//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309—311.

⑩ АВП РФ. Ф.059а. О п.7. П.13. Д.4. Л.40—41.//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С.182.

府对国内犹太人的迫害再次升级。“斯兰斯基案件”和“医生间谍案”令国际社会哗然,从而激化了苏以双方之间的矛盾。^①以色列国内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苏游行,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也遭到炸弹袭击。^②1953年2月11日,苏联政府宣布撤走驻以使馆的全体人员,断绝与以色列政府的外交关系。^③此后,苏联政府抛弃了“中立”的立场,开始实行“亲阿反以”的政策。

经过一系列风波,苏联政府接管“俄国财产”的计划被迫延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政府实行“和平外交”,着手改善与第三世界的关系。1964年,苏以双方签订了有关买卖“俄国财产”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以色列政府向苏联政府买下大部分财产,并以国内出产的柑橘来支付。^④后来这份协议被称为“柑橘协定”(Апельсиновая Сделка)。^⑤该协议由双方秘密签署,实质是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占有“俄国财产”的正式承认。

结 语

本文是对“冷战在近东地区的形态及其特征”这一问题的回应。通过考察苏联、以色列双方围绕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接收问题的交涉,还有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对耶路撒冷归属权的争夺过程,以及美苏两大国对耶路撒冷相关问题的应对策略,笔者提出了两点思考:

其一,近东地区“被卷入”冷战并非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而是苏联、美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多方互动的结果。美苏双方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将对对方的近东政策视作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力图填补英国留下的权力真空,扩大在当地的范围,为此对近东各国进行拉拢或施压。而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政府也正想借助大国的力量,一来有助于达成某些外交目标,二来也可以获得援助并提升国力。于是,这些国家刻意渲染近东地区的冷战氛围,进一步加深了美苏双方之间的不信任与敌意,谋求从大

国相争之中渔人得利。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以色列方面以“俄国财产”落入英美之手来要挟苏联方面让步。当苏方决定不再参与调解“耶路撒冷之争”时,影响因素除了苏方对苏以关系、美以关系、苏联与阿拉伯各国关系的考量之外,或许还有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怂恿。然而,近东各国政府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最终间接地加剧了美苏在近东地区的敌对态势。

其二,近东地区的冷战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与欧洲主战场的情况对比可谓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当地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思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拥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这直接造成双方之间的冲突频发,也导致耶路撒冷成为各国争抢的“香饽饽”。而这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形成了一道“文化的屏障”,阻碍了美苏对近东当地事务的过度干预。正如在调解“耶路撒冷之争”的过程中,美苏两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尴尬无力的状况。又如苏联政府通过东正教会代表到以色列接收“俄国财产”的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如此一来,美苏意识到很难利用意识形态输出的手段扩大地区影响。近东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美国和苏联的本土,两国政府也不会轻易往当地派兵。于是,美苏只能选择支持以色列或阿拉伯世界其中一方来加强自身影响力。这自然就给近东各国领导人留下了与两大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空间,而美苏从此也再难从近东问题中抽身。

尽管如此,冷战仍然对近东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深远影响,某些当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例如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在历次的近东战争当中,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都处于冲突的核心位置。以色列和约旦一直在扩建这座城市,使耶路撒冷的范围持续扩大。联合国则多次谴责以约分割耶路撒冷,否定这种占领行为的合法性。迄今为止,在耶路撒冷设立使馆的国家只有美国和危地马拉,其他国家的驻以使馆都在另一座城市特拉维夫。近东地区的纷争并未停息,和平共处之路仍崎岖难行。

(责任编辑:林 广)

① АВП РФ. Ф.089. Оп.6. П.15. Д.4. Л.2—3.//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430.

② 1953年2月9日,一颗炸弹在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地面爆炸,造成数位工作人员受伤。以色列政府声称无法查明这次爆炸事件的肇事者。 АВП РФ. Ф.059. Оп.30. П.53. Д.311. Л.45—46.//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421—422.

③ АВП РФ. Ф.089. Оп.6. П.15. Д.4. Л.2—3.// Советского - 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430.

④⑤ Uri Bialer, *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 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67*, pp.161—164, p.164.

understand the American Woman's Suffrage Movement.

The Population Crisi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Israeli Kibbutz

(FAN Lihui)

Before the founding of Israel, the kibbutz, a kind of collective settlement, became the main place to attract Jewish immigrants.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1980s, the kibbutz encountered a population crisis. This was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the weakening of ideological identity, the gradual loss of political appeal and the outbreak of economic crisis. To reverse the population decline, the kibbutz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reforms, such as the privatization of consumption and service sectors, the re-distribution of salaries, the chang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s, and it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Eventually, the kibbutz completed its transition.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kibbutz was fundamentally reversed, the satisfaction of its members improved, and the population recovered.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mages during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YIN Jiuzhou, FENG Wei)

During the invasion of China,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image of the invader and made itself a liberator", Japan employed public opinions to fight agains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ces behind the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The local propaganda under Japanese control portrayed Britain as "colonial empire" who was "the gatekeeper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cancer of the new order construction", and describe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new "hegemonic empire" who attempted to achieve world hegemony during its formal intervention in the Far East affairs. By shaping and exaggerating the negative images of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arousing the anti-British and anti-American sentiments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Japan abated the anti-Japanese feelings in China, and put on the cloak of justice for their aggressive behaviors.

The Mediation of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35)

(ZHOU Yuxiang)

From 1890 to 1935, managers and workers began to mediate their relations in the U.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labor community, workers appealed to the union. They demanded employers to hire only labor union members, which was called "the closed shop movement". But employers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free employment, insisting that all laborers had the equal rights of work. In fact, it was an "open shop movement" in which employers decided employments without any interference.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 not completely laissez-fair. It made its own choices. Initiall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gulated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by issuing labor injunction. Finally, it declared the open shop movement and the closed shop movement illegal. Instead, it confirmed the legitimacy of collective negotiation. This not only signaled the end of the mediation of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bu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U.S. chose the legal path of collective negotiation which was supported by all parties.

"Russian Property" in Jerusalem and the Soviet Policy Toward Israel (1948-1953)

(JIANG Yipeng)

To break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ntrol of the Near East, the Soviet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reclaim "Russian property" in Jerusalem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However, affected by the Cold War and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s, the Soviet-Israeli negotiations about "Russian property" were re-directed to the Arab-Israeli "Struggle for Jerusalem". A series of events revealed that the Cold War had

(下转第160页)

过提供一些史料进行深化和拓展,总结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达到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论证、史料解释、唯物史观和家国情怀的核心素养能力的培养。

第四,学生学习效果:上课注意力集中;熟悉教材,快速而准确的提取、概括知识点;积极配合教师授课,踊跃参与师生互动,语言表达简洁、准确、专业;自主总结本节课重要知识点和知识线索的情况;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析历史问题的能力;阅读材料,归总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第五,自身教学效果:气球的导入,调动情绪,较好地引导学生进入上课状态;教学与课堂管理兼顾,及时指导、纠正问题、培养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教学环节设计紧凑,时间分配得当,重点突出;知识结构突出重点,线索性强,重难点得以突破。

最后,时间分配上有前松后紧的现象;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过多,无形中造成学生的学习压力;由于自己备课时欠缺考虑,没有掌握学生实际情况,导致一些预设不成功。

总之,只有我们不断理解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此为依据进行备课、上课,不断落实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能力,才能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切实解决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教育工作者“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确保我们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责任编辑:李月琴)

(上接第 180 页)

reshaped the diplomatic pattern in the Near East and had made the social-economic problems more complex in the area. This article suggests two points: 1. The formation of Co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as not a passive but an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the U.S., Israel and Arabic countries. 2. Due to the local religions, the Co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as not heavily ideologically driven. Instead, there was a cultural barrier between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the two super-powers.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on the Technicians for Rice Plan (1955—1956)

(AN Junpu)

The rice exports of Burma encountered poor sales after the Korean War.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hindere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of Burma proposed the plan of “technicians for ri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However, rice was also unsalable in the U.S. at this moment. The U.S. government thus reacted coldly. With the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Burma became the tar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xpense of economic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sign the agreement on rice for technicians with Burma to prevent Burma from falling into the socialism bloc in 1956. It reflected that small states could make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maximize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by improving their diplomatic capacity. Meanwhile, by changing 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other powers,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in line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great powers would achieve the goal of safeguarding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